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六五期 ——
(二〇一〇年九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9a)

【沧桑纪事】	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四)	陈小津
【史海钩沉】	内蒙全面军管与余洪信事件	高原
【百家争鸣】	关于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丁凯文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 (十九)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沧桑纪事】

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四)

• 陈小津 •

◇ 令人发指的残害

张春桥在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后，多次叫嚣“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张春桥一伙在迅速扩充其帮派势力的同时，疯狂残害上海各级领导干部。在“文革”前 800 多名部局级以上干部中，受到严重迫害的干部约占四分之三。其中，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被极其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所熟悉的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明新和原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就是被迫害致死的两位高级领导干部。

赵明新 1931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天津市团市委宣传部长、青工部长。1932 年，他在天津被捕，一直到 1936 年 10 月才获释。1935 年，赵明新由狱中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鲁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胶东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从 1949 年起，他开始长期在我父亲手下工作，担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1952 年底，他调任上海市委常委

委、组织部长、市人事局局长。1955年，他调吉林任一汽党委书记。1965年9月又调回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新明平易近人，又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员干部十分关心，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1966年8月，康生、江青阴谋挑起了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赵明新是遭诬陷的六十一人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六十一个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其中“文革”前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些人大多在30年代初因河北省遭到破坏而被捕的，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里。在狱中，他们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并同外面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与敌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到1936年，虽然有的人刑期早满，但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仍然在狱中坚持斗争。1936年春，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央北方局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做出组织决定，并报党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通过关系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狱中党支部。于是，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先后有52位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分批履行手续走出了反省院，另有9位同志也以其他不同方式获释。这批同志出来后，党组织立即为他们分配了工作。到解放前，其中的10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幸存下来同志逐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文革”刚开始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借题发挥，揪斗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中央为此发出两封电报，说明刘、赵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要红卫兵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而老奸巨滑的康生对这件事本来心知肚明，他曾在1948年对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同志讲起这批党员出狱的经过，但为了打倒刘少奇及这批老干部，故意把水搅浑，于1966年8月重新提出这件事，并让专案组立案审查，得到江青一伙的积极呼应。从1966年11月下旬起，南下的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和长春一汽的造反派先后找到赵明新，纠缠他调查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赵明新解释了自己的获释经过，并请示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魏文伯明确答复：“此事中央知道，这是组织决定。”

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后，中科院华东分院各造反派组织开始夺权，疯狂批斗迫害领导干部，赵明新首当其冲。赵明新身患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被揪斗得住进了医院。1967年1月14日，一个叫“革命造反团”的造反派组织不顾医院的意见，非要将赵明新揪回长春批斗，强迫医生开具出院证明。医生特地在出院证明上注明需继续治疗，并开了三个星期用量的药品、针剂。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是须臾离不开药物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造反派不仅断绝了赵新明的治疗，连医生给的这些救命药物也扔了。他们把赵明新关押在中科院华东分院七号楼的“革命造反兵团”总部。1月16日，造反派在衡山电影院召开“砸烂华东分院党委，打倒大叛徒赵明新大会”，赵明新被批斗、折磨长达8个小时。他多次向造反派坚定地表示：自己“历史问题从来不认为是问题”，“在监狱中从未承认是团员、党员”，“办出狱手续是服从组织决定，中央批准的，完全可以搞清楚”。18日中午，家人前来探望，赵明新说自己的病情又恶化了。似乎造反派们也知道这么虐待一个重病号是会激起民愤的，当晚，把他秘密转移到生理研究所办公楼旁的一间不见阳光的废弃工场里，并禁止家属探望。19日，造反派又审问了赵明新一通，要他交代与陈丕显、魏文伯这条“黑线”的往来关系。得知造反派要将自己押往严寒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批斗，赵明新当天还亲笔给夫人罗军写了一张纸条，嘱她买棉衣、皮靴等必需品。但是，当罗夫人20日中午准备来送这些东西时，却接到通知，要她去中山医院。罗夫人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时，赵明新已经停止了呼吸。

关于赵新明的死因，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的技术鉴定是“系高处坠落颅脑损伤，引起死亡”。20日上午11时，生理研究所有人发现赵明新仰面躺在生理所办公楼的外面，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他究竟是如何“坠落”的，当时并没有认真追查。赵明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

月风暴”中被迫害致死了。

“文革”发端于文化、教育口，身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长的常溪萍理所当然地成为江青、张春桥一伙轰开上海市委“堡垒”的突破口，除此之外，常溪萍与聂元梓的一段宿怨也是他在劫难逃的原因。常溪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宣传干事、黄县县委组织部长、中共胶东区委秘书长。解放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54年6月调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64年11月，中央要求全国各地抽调200多名干部到北京大学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上海从各高校抽调了40名干部，由时任市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带队前往，并担任北京大学社教队党委副书记兼西语系工作组组长。在如何看待北大的“阶级斗争”总的形势、如何对待北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陆平的问题上，常溪萍与时任社教队党委书记的中宣部副部长Z某产生重大分歧。Z某听信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介绍及建议，认为“北大党组织严重不纯，坏人混入了党内”，片面夸大了北大问题的严重性，工作队进驻后不久就夺了校党委的权，仅仅根据揭发材料就揪斗了50多个校、系干部，而且不问实际情况，规定各系一律在十天内形成批斗高潮。校党委书记陆平被视为“坏人”，挨了打。而常溪萍对这种明显脱离实际的“左”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见。1965年1月中央制定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常溪萍在学习《二十三条》过程中，认为这些规定确实打中了北大社教工作队存在问题的要害，建议工作队认真学习《二十三条》。而工作队的Z某竟在常溪萍写的一份报告上批了一个大大的“右”字。

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期间，向上海市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和候补书记杨西光汇报了北大社教的有关情况及其自己的意见。张春桥和杨西光听了后，都表示同意常溪萍的看法，并认为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里提，也可以向中央反映。

3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北大的社教问题时，对北大工作队的这一作法提出了批评。常溪萍听了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后，对照北大社教运动的实际情况，又向Z某提了意见。但Z某不但不接受，还把常溪萍调离了西语系。3月4日和11日，常溪萍先后两次写信给张春桥和杨西光，信中说：“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意见，基本上都遭到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不知可否，请速示。”张春桥首先圈阅了这封信，还批给市委其他书记阅。这件事还在一次书记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常溪萍向中央反映问题。

3月17日，常溪萍遵照市委的指示，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信。随后，中央办公厅约他谈了话。4月初，中央调整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成员。在新的三结合“社教运动核心小组”领导下，常溪萍等对过去揭发的材料进行认真负责的调查核实，推倒了那些不实之词。6月底，工作队放假，常溪萍回到上海，经上海市委决定并报中央同意，他不再回北大社教工作队工作，提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本来，常溪萍在北大参加“社教运动”的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工作经历，在“文革”初期却成了他横遭诬陷攻击以至受迫害致死的源头。

1966年5月25日，由聂元梓等七人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是康生通过她的老婆曹轶欧怂恿、组织聂元梓等人撰写的。6月26日，曹轶欧把北京大学13人写的一张题为《常溪萍在北京大学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及有关材料，别有用心地寄给在上海的张春桥。大字报中“揭发”常溪萍是北京大学社教工作团“内部跳出来的反攻倒算的急先锋”，为北大“极端严重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张春桥接信后，让市委办公厅把大字报及有关材料摘要印发给市委各位书记。20多天后，聂元梓等人又炮制了一张题为《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

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一式两份，想一份贴到常溪萍现在的工作单位，一份贴到华东师范大学，但没有寄出。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给常溪萍扣上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如“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等。

7月26日，“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一批人来到北京大学，准备当晚召开师生大会。会前，江青找聂元梓等所谓“左派积极分子”谈话，聂元梓乘机向江青告上海市委的状，说大字报一个月前就送去了，却没有动静，“中央文革”能否把这张大字报帮助转到上海贴出来。江青当即表态“可以帮助转”，还狠狠地说：“上海不贴，我去贴！”并把大字报交给了张春桥。在骄横的江青面前，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虽对所谓的常溪萍问题非常清楚，但他仍点头哈腰地附和着，答应叫上海市委把大字报贴出来。而就在第二天，张春桥把两张大字报交给了来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曹荻秋，也许是碍于当初他曾认可过常溪萍的做法，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把自己也填了进去，所以当时他未对曹荻秋讲任何处理意见。

接到大字报的曹荻秋认为不应草率地把大字报贴出来，就去请示小平同志。邓小平指示：北大的社教问题，中央书记处已经作过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挑起了。小平说“可以不贴”，并要曹荻秋再同康生研究一下。曹荻秋在会场碰到康生，康生说：“研究研究再说。”因此，曹荻秋在给杨西光打电话时说，贴大字报一事可暂缓处理。

上海不贴大字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青耳朵里，她火冒三丈。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8月6日，她找来曹荻秋，要求上海把北大批判常溪萍的大字报贴出来，并疾言厉色地说：“不贴，你们市委要被动。”而此时看清了风头的张春桥也于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这一天，给曹荻秋写了个条子，替江青帮腔，要曹荻秋回到上海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上海市委被迫将这两份大字报贴了出来，同时不得不宣布停止常溪萍的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领导职务。

9月20日，聂元梓等成立所谓的“常溪萍问题揭发小组”，并又写一张长达8000字的大字报，题为《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革命倒算的急先锋》。11月20日，聂元梓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来沪兴风作浪。她说：“常溪萍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在上海，揪出了常溪萍，就意味着上海市委负责人包庇了“黑帮分子”，造反派就可以此为借口“炮打”上海市委，这就把矛头指向了上海市委。

常溪萍被“揪出”后，立即陷入了被红卫兵揪斗的旋涡之中。上海许多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争抢着把他弄去批斗。挨斗时，常溪萍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长时间弯腰、罚跪，经常遭拳打脚踢。有一次批斗时，常溪萍从头到脚都被贴上大字报，衣服上沾满了浆糊。1966年底，在“华东师大造反大队”等组织的所谓“红色风暴”事件中，一些造反派在校内外游斗常溪萍，居然用几根绳子套住常溪萍的脖子，从不同方向拖，哪边劲大，人就得往哪边走，还一边开心地喊着“绞死常溪萍”，一边拿竹杆赶打他。“文革”啊，居然拿人命取乐，道德沦丧！

“一月风暴”后，对常溪萍的揪斗更加频繁了，谁想拉去批斗都可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有一段时间，他被从早斗到晚，深夜押回来，还要继续写“交代”材料。常溪萍的一条腿被打坏了，不得不用一根木棍撑着走路；长达数小时批斗，他实在支撑不住，要求跪下来。造反派不仅不允许，还对他拳打腿踢。一次他到厕所大便，有学生到房间没见到他，就说常溪萍逃跑了。一群造反派把他从厕所里拖出来就是一顿痛打。还有一次，一个造反派一面呵斥常溪萍，一面用小榔头狠狠地向他头部敲去，鲜血立即从他头上往下流，而他忍受着疼痛，一声不吭。学校文艺小分队演戏时，造反派假戏真做，把常溪萍拉上台扮演被打倒的“走资派”。台下一喊

“打倒常溪萍”，台上就将常溪萍猛然推倒在地，几只脚踏上去，狂喊“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有时还会用枪托等砸下去。常溪萍被打得爬不起来，就被拖到后台一丢了事……

当常溪萍被造反派批斗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的时候，一直躲在幕后指挥这一切的张春桥终于要落井下石了。1968年1月15日，已当上上海“革委会”主任的张春桥，亲自来到华东师大，参加全体师生大会。他在大会上狡诈地说：“华东师大在我们上海地区是很有名的，这个有名无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了常溪萍。有了常溪萍这个对立面，就有红卫兵……”“你们红卫兵有打倒常溪萍的战功！”他别有用心地说：“不要认为校革委会成立了，就太平无事了！要把队伍清理好，把坏人清除出去！”华东师大造反派心领神会，自然把常溪萍当作最大的“坏人”进行清除。当时的《新师大战报》上，就赫然登载了这样一篇肉麻的文章：

“敬爱的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他最坚决最坚定地支持我们新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将揭发大叛徒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的大字报转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边亲自授给我们“文革会”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张春桥视察华东师大半个月后，造反派变本加厉对常溪萍进行折磨。他本来就有糖尿病、慢性肝炎、胃病等病症，经此摧残，病情明显加重，但他还倔强地活着。不把常溪萍从这个星球“清除”掉，张春桥是不甘心的，1968年4月4日，他在“上海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再次公开点名攻击常溪萍，说：“我们上海有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我们说有的。最近几天我看到材料，华东师大不是有人起来为常溪萍翻案吗？常溪萍这样的人，我看全市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了，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要给他翻案，说常溪萍是个好同志！”文汇报等“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纷纷大放厥词，其中文汇报一篇题为《右倾翻案风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社论中说：“最近，在一个大学里，还有人公然跳出来，为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溪萍鸣冤叫屈。”该报还在4月11日一篇“编者按”中说：“值得深思的是，像常溪萍这种投靠彭真的大叛徒，为什么居然还为他翻案呢？这就说明，要彻底打倒这一小撮凶恶的敌人，还要花很大的力气……谁想为他们翻案，那就和他们一起上‘西天’！”

尽管常溪萍并不知道有人为他写大字报鸣不平，但因他又被张春桥点了名，而且又被报纸宣传是“时时刻刻准备翻案复辟”的“凶恶的敌人”，等待他的命运如何便可想而知。张春桥大放厥词一个星期后的4月11日晚上，常溪萍被一批打手拉到文史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殴打，打折了三根扫把柄后，就换上木拖把再打，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不断凄声呼唤着：“求求小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凄惨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不忍卒闻。可这个打人凶手仍然边打边骂：“打死你这条老狗！打死你这条老狗！”又朝常溪萍身上猛踢几脚。还有一个造反派，竟用一根头上带有铁钉的三尺多长木棒朝常溪萍身上打去，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惨叫，瘦瘦的脸立即肿胀起来，眼睛几乎都张不开来，嘴角上淌着血……

旧病新伤，使常溪萍奄奄一息，可造反派不给他看病吃药，也不许常溪萍理发、洗澡。关押他的那间屋子臭气熏天，连来向他了解情况的“外调”人员都受不了，只好把他带到室外问话。5月25日，常溪萍上午还在写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下午快两点时被发现从三层楼窗口坠下。在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抢救时，他仍然清醒着。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他很艰难地回答：“我……不是……自杀。”一个多小时后，常溪萍经抢救无效，含冤离开人世。这时，距张春桥最后一次点他的名不过两个月。这是张春桥欠下的又一条人命！

~~~~~  
【史海钩沉】

## 内蒙全面军管与余洪信事件

• 高 原 •

启之先生关于内蒙地区文革进程的力作《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竣稿几近二十年，惟成书过程一波三折，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今年一月，由天行健出版社在香港出版。

《内蒙文革实录》对内蒙文革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影响述之甚详。作者认为：“与其它省、市、自治区相较，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挖肃’为主的‘革命’所要解决的民族问题，亦即乌兰夫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推行‘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构成了内蒙古文革的基本内容，在内蒙古的三大冤案中，死、伤、残最众的两个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都是整‘民族分裂’的产物。可以说，文革在内蒙古‘革’的主要是‘民族分裂’的命。”（《内蒙文革实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1月，25页）

笔者更有兴趣的，是本书所反映的内蒙文革与军方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从文革前直至文革后的1978年，内蒙的历任第一把手全为军人。按时间顺序，他们分别是乌兰夫（1949—1966.8）、滕海清（1967.4—1969.12）、郑维山（1969.12—1971.1）、尤太忠（1971.5—1978.10）。文革前，乌拥有上将军衔，滕、郑均为中将，尤为少将。除乌兰夫外（乌在文革前是军地两栖、以地方工作为主），军人们对地方工作极不熟悉而又刚愎自用，执行政策的思维通常都是宁左勿右，这就决定了内蒙文革中的冤案严酷、惨烈程度在全国来说都是罕见的。

1967年11月，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代司令员滕海清为主任、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等为副主任的内蒙革委会成立。1968年1月，内蒙革委会即号召打一场“大挖乌兰夫黑线、大肃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同年7月，内蒙革委会指内蒙有些地方阶级阵线不清，必须普遍深入地开展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内容的“挖肃”运动，从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内人党”大冤案，挖出了十三多万人。同年11月，内蒙革委会决定批判地方干部、原革委会副主任高锦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基层充分发动群众，把混在群众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于是，“挖肃”运动又一次掀起高潮，一直挖到革委会内部和广大农牧民群众中。至1969年3月，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参见《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史资料》，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236—237页）

内蒙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严重扩大化倾向，连“清队”的始作俑者毛泽东都有些看过眼。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批发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即“五二二批示”），要求迅速纠正前一阶段“清队”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惟“五二二批示”又令两派群众组织形成新的分歧，致使全区各级革委会瘫痪或半瘫痪。

在此混乱的形势下，中央没有按惯常的做法，更换未能控制局面的自治区党政军第一把手滕海清，而是将其晾在一边，另起炉灶。中央竟然决策，对内蒙一分为五，对保留部分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军管范围不止于地方各级革委会，还包括军分区（警备区），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独一无二、未有先例的。

196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跨省区调整内蒙东西两段的部分行政区划。将东段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辽宁省领导；西段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和阿拉善左旗分别划归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区域缩小，变为四盟二市，即：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史资料》237页）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于篇幅关系，《内蒙文革实录》对“12·19”决定只引用了头尾的文字，略去了具体部署的中间部分。实则该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全文如下：

鉴于内蒙古地处防修前线，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很快落实备战动员，实现五个统一，搞好斗、批、改，加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进程，而内蒙古目前工作并不能适应这一需要，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的思想状态又不统一，因此，中央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其具体部署如下：

一、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以上四人组成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书记，黄振棠、杜文达为副书记，实行对内蒙的一元化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前指的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从北京军区抽人组成前指办事机构。

二、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盟、锡盟、乌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九军、二十七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所有军管单位，均以战备为纲，抓好革命和生产。

三、六十三军由曹步墀副军长、田荫东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负责包头市、内蒙铁路局、乌达、石拐子两煤矿、河西公司的全面军管工作。

四、六十三军一八七师的原定部署不变。由六十三军副军长余洪信和一八七师副政委王雪，并加强干部四十至五十人带五六〇团三营负责巴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巴盟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从磴口迁到临河。

五、六十五军由耿淑明副军长、靳甲夫副主任和一九五师崔毓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一九五师五八三团，进驻锡林浩特，负责锡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六、六十九军由周衣冰副军长和周发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进驻集宁，带领一个团负责乌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七、二十七军由向孝书副军长、蔡云璞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四个连负责呼和浩特市全面军管工作。

八、二十七军由八十一师常道德副政委、郭学泮副师长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必要干部和部队，负责伊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九、各部队进驻后，要以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为指针，以“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为武器，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持“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过细

地做群众工作，团结内蒙各族人民，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力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内蒙文革实录》指出：“可是，全面军管却是全面左倾，说白了，就是全面镇压和全面庇护——一方面，军管会非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内人党’的受害者落实政策，反而把提出这种要求的苦主视为破坏战备、破坏民族团结的捣乱分子。重者重新系狱，轻者以‘有民族情绪’的罪名加入冷宫，不给分配工作。”“另一方面，以郑维山为首的‘前指’将那些民愤较大，品质恶劣的干部尽可能地调出内蒙”。（《内蒙文革实录》433页）

军管后，“前指”对内蒙的干部采取了大换班的做法。从1970年1月10日开始，将自治区革委会领导成员、区直机关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共计7,769人送入中央办的唐山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各盟市干部3,337人分别送入河北省柴沟堡和山西省阳高等地学习班。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各盟市革委会的工作，实际上由“前指”和各军“领导班子”取代。在学习班里，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段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运动，并规定学员不准通信；不准会客接待亲友；不准用民族语言书写和会话；不准串连；不准私自出入，以隔断干部与内蒙地区的联系。（见《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史资料》240—241页）

借军管之名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最甚者，当为负责巴盟地区全面军管工作的六十三军副军长余洪信。据军队方面的资料称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执行军管任务期间，依仗权势，采取思想腐蚀、物质引诱、持枪威逼等手段，强奸、奸污、侮辱妇女33人。余还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非法捆绑、扣押、批斗、打骂部队、地方的基层干部战士和群众。余所犯罪行被揭发后，军党委根据北京军区党委的指示，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余犯对教育帮助他的同志视若仇敌，图谋行凶报复。（1972年）5月18日凌晨，余犯企图行凶杀害军长、政委未逞，开枪打死军政委曹步墀同志的爱人邢玉荣，打伤军副政委杨兆魁和战士张彦平后，携械潜逃”。

余洪信是在位于山西省会太原市内的六十三军军部行凶杀人的，行凶的对象不是一般人而是军长、政委，此事闹得不是一般的大。军方打破“家丑不可外扬”的惯例，立即通告地方协助捉拿归案。国家公安部旋即两度向全国发出“查缉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通缉令”，其中第二号“通缉令”称：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军管会：

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

余犯现年四十七岁，男，身高约1.8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徽（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镀钢笔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置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



凶、自杀、逃跑。并速告我部。

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安 部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从第二号“通缉令”发出日期可以得知，案发十一天之后尚未有余洪信下落的任何头绪。惟后来发现，余其实并未逃得太远且已自杀身亡，军方资料称其“畏罪自杀在山西榆次市郊区的麦田内”。

余洪信事件暴露了军内的诸多问题。当年8月总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在经毛泽东批准召开的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称：“1970年12月，谭甫仁同志被害，而警卫员贪生怕死，听到凶犯开枪，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今年5月，六十三军副军长余洪信行凶，打伤该军副政委杨兆魁同志，打死该军政委的爱人。余犯行凶持续二十分钟左右，打了十几枪，当即有人报告警卫分队，竟无一人出来捉拿凶犯，甚至慌乱一团，有的吓得跳窗逃命，有的吓得趴倒在地。这两起案件是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

余洪信事件表明，如果说“三支两军”在1967—68年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1970年后即完全走向了反面。更重要的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无疑使毛泽东极大地增加了对军队的戒心。故此，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省、军级单位发出毛批示“照办”的《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称：“最近，毛主席建议中央认真研究一次三支两军问题。中央责成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并经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代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内称：“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

而身兼内蒙“前指”第一把手的郑维山，早已于1971年1月华北会议结束时因北京军区改组而被免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黯然下台。内蒙全面军管实则于1971年5月随着中共内蒙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内蒙革委会“补台”而宣告结束。《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发出后，内蒙全区二千六百多名“三支两军”人员，于1972年始至1973年7月份分批全部撤出“三支两军”。

2010年8月

□ 原载《记忆》第56期 2010年8月30日

~~~~~

【百家争鸣】

关于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 丁凯文 •

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是西方学者近年来就中国文革史研究的具有独特意义的专著。该书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史料，同时也吸取了不少这些年来史学界有关文革史的研究成果，详细地解析了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作为西方史学界研究文革的

代表作，该书对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无疑会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书中论述的“林彪事件”是笔者关注的重点，研读之余，感到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1〕关于毛泽东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一事，作者认为毛泽东真实的意图是传位于江青和她的亲信，而非林彪。作者指出：“林完全可以怀疑，主席之所以决定将其立为接班人，只是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让另一位毛派的狂热信徒顺理成章地接班。否则，主席为什么要建议林，林自己也应该指定一个接班人，并且点出了张春桥的名字，而让林大为尴尬呢？尽管毛没有公开力图推动他的建议，但至少表明了：在毛看来，他的妻子及其亲信才是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接班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星克尔出版社2009年4月版327—328页，以下简称该书并只标明页数）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彪在庐山上主动发起的针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斗争，使毛泽东赫然发现，林彪在党内竟然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而文革极左派张春桥一伙又是如此不得人心，林彪的一篇讲话就几乎置张春桥于死地，如非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极左派们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而毛泽东倾其后半生发动的文革运动就有可能在其身后被否定被清算，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由此而观之，林彪绝非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而江青、张春桥们才是毛真正意义上的衣钵传人。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力扶植江青等文革极左派，尤其是让这伙人逐步地掌控军权，张春桥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常委，而这在林彪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江青、张春桥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也只有他们才能在毛身后继续推行毛泽东那套乌托邦的理论和实践。该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看得是很准确的。

〔2〕关于林彪是否有“篡党夺权”的意图，作者对此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作者指出：“尽管中共的党史学家是如何受到鼓励去批评文革的观念和必要性，但是还没有什么人愿意说：主席为了搞文革，无情地密谋打倒其过去的亲密战友。一个晚年误入歧途的战略大师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暗地里策划卑鄙手段的黑帮头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划了第一任接班人的倒台，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从而部分地降低解放军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导份量。文革后，国家主席问题被当作是林彪图谋‘夺取最高权力’的证据。这样一个罪名会不会是毛给林构陷的呢？人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动机仍然晦暗不明。但是，为什么毛就在自己还在准备林彪的罪状、林彪还没有逃跑和死亡的时候就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呢？”（该书329页）

有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早有大陆的学者予以论述（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见《重审林彪罪案》上册，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在“913事件”前，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至多是对毛泽东的劝进，希望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时出任国家主席，林彪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一致赞同。文革极左派的重量级人物康生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387页）而最先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者却是毛泽东自己，毛泽东在1971年8月南巡途中，指责林彪“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急于夺权。”可毛泽东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该书作者看到这一关键的问题，指出：“既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叶群的野心，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希望得到这一职位。”（该书329页）事实上，“913事件”后中共拿出来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在关押期间的交代，即“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但是这唯一的证据也被吴法宪日后所否定，指出那不过就是专案组“逼供信”

的产物。由此可见，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不过就是毛泽东的构陷，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法理依据完全是向壁虚构。

〔3〕关于林彪是否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发动一场旨在推翻毛泽东的“政变阴谋”，该书作者明显持怀疑态度。作者指出：“正是由于9月12日至13日事件的戏剧性，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材料和中国史学家叙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质疑。”“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参与了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所谓阴谋，还是被动地听天由命。9月12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药后已经上床睡觉了。在其妻子和儿子把他推进汽车，风驰电掣地赶往机场时，他是否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此也完全有理由产生怀疑。”（339页）

该书的作者在此并不盲目地轻信大陆官方长期以来的一贯说辞，而是采取客观的态度质疑官方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总之，有难以计数的、疑窦丛生的问题。”（该书339页）大陆官方在“913事件”后指责林彪和叶群密谋策划了针对毛泽东的“武装政变”阴谋，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在前台发动这场政变，并将林立果周围的亲信的“供词”作为林彪涉案的证据。然而迄今为止，世人所知的由官方披露出来的林立果在北京策划的所谓“杀毛”大计，皆为中共官方公布的“批林”材料，应属刻意地加工，突出渲染了所谓林彪要谋害毛泽东的种种罪行，而内容皆属于林立果周围个别亲信人士在“913事件”后的口供，其真实性和可信度殊为可疑，在那个年代里官方可以任意制造出他们需要的“口供”，这早已被太多的史实所证明。尽管如此，林彪涉案的直接证据却几近于无。退一万步说，即使官方指控林立果策划“政变”的设想完全属实，亦无证据将林立果的言行与林彪直接划上等号。由此而观之，那个所谓的“杀毛”的设想仅仅是林立果的一厢情愿，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未付诸实施。根据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向专案组的交代，林立果把“杀毛”这件事看得很轻松很简单，似乎可以一蹴而就，马到成功，根本没有任何周密系统的计划，诸如如何指挥、调动相关的部队，如何负责侦查与情报，如何具体准备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如何策划组织和宣传工作，特别是作好相关人士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进行善后事宜等等。所有这些均付之阙如。如此之“杀毛”设想焉有成功之理？这只能是林立果这位从未上过战场、从未指挥过军队打仗的年轻后生的异想天开，其设想的流产也是必然的。笔者认为，以中央专案组多年来在林彪一案上制造伪证、假供等种种劣迹来看，对林立果的相关指控也不排除是专案组人为制造逼供信之后的产物，所谓林立果策划“杀毛”一事应可存疑，指控林彪涉案就更是一个天方夜谭。笔者期待相关档案的解密和有关当事人披露出更多的真相。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是，林立果确实想通过非常手段打击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林立果曾对江腾蛟等人提及林彪痛恨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此一点应无疑义，否则林彪也不会在庐山会议上“太岁头上动土”公然打击毛泽东的心腹张春桥。

笔者还想对该书中就林彪事件的某些看法提出不同意见，就教于方家。

〔1〕有关“国家主席问题”，该书作者设有专门一个小节予以论述。作者说：“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在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主席，显而易见，这个职位并不是一个革命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此外，毛曾经担任过那个职务，他讨厌它的繁文缛节，而且他不需要权力的装饰。”（该书328页）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权结构与苏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某种不同。其相同之处是，两国都是以党领政，党中央总书记（苏联）或党主席（中国）居于绝对领导地位，是最高权力的核心和领导者，而党的最高领导者不必非兼国家主席不可。中苏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苏联虽然没有设国家主席一职，但不等于苏联没有国家元首。苏联的国家元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8年前先后称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1959年以前毛泽东身兼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于一身，搞的是大权独揽，而列宁与斯大林没有兼任这一职务，只说明他们在权力上的独裁程度尚逊于毛泽东。虽

然国家主席一职在中国纯属政治上的摆设，但毕竟还是出现了“天有二日”的现象，文革中的毛泽东铲除刘少奇后吸取了让位于刘少奇的教训，这一次毛无论如何都不愿重蹈覆辙，毛自己则不好重新拾起刘少奇戴过的这顶帽子，又不愿交予他人——包括他的“接班人”林彪，所以毛干脆提议将该职废除，而其所持的理由皆为强词夺理，无以服人。毛泽东的这一阴暗心理，聪明如林彪、周恩来者都不曾看透，更遑论其它人了。因此，该书作者认为“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并不准确，因为那实在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了。

毛泽东真的不需要“权力的装饰”吗？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该草案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即称：“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对此笑纳，甘之如饴。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革命国家”还是民主社会，国家的宪政体制都需要有一个国家元首。庐山会议通过的这部宪法其最后的定稿恰恰说明毛泽东需要这么一个“权力的装饰”。换句话说，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毛泽东都要占上，还要对社会、大众有个交代。正如文革史学家余汝信所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不就是‘国家元首’罗嗦一点的说法吗？这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1970年宪法草案的一个创造性提法，它更类似一个尊号，无须履行任何实质性职权。国家元首的部分职权，实际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完全浸透于宪法条文之中；与现代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以人入宪，以接班人入宪；毛泽东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并无具体职务但仍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国家元首的部分实际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但却无国家元首的名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改称主任而无实际职权，这些，都是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首创的‘特色’。”（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97期，2007年9月11日）因此，说毛“讨厌它的繁文缛节”不过就是其表面现象而已，废除了“国家主席”一职，使毛泽东既可享有“国家元首”之实，又无需担心大权旁落，真可谓一举两得。

〔2〕该书作者在提及设立国家主席问题时说：“事实上，在7月下旬，据说毛让其秘书打电话告诉林彪办公室：‘我不当，你也不当。让董老去当，让几个年轻人当副主席。’”作者进一步推测说：“这也可能是一种挑衅：让年轻人担当此职，有可能就此威胁到林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林彪还会继续拒绝担任此职吗？”（该书331页）

该书作者在这里的推测应该是对毛泽东原意的误解。作者此处所言的时间有误，毛让秘书给林办打电话的时间不是1970年7月，而是当年的4月份。4月11日，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几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的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中央政治局。这是林彪第一次就“设国家主席”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毛泽东的秘书高必成打电话给林办，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于运深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舒云采访林彪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221—222页）另据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回忆，陈伯达说：“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可以让陈永贵当。”（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6月版378页）从中共高层互动的情况来看，包括林彪在内的政治局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毛泽东是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毛泽东出任这一职务。林彪提议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应是揣摸毛泽东的心态而提出，“劝进”总比贸然响应更为稳妥。毛泽东口中所言的“董必武”或“陈永贵”可当国家主席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很大程度上说的是“气

话”——毛的不满是因为林彪、周恩来等人竟然都不理解毛泽东推辞国家主席职位背后的真实含义与动机。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本意是，毛泽东决不可能去接被打倒了的刘少奇的班，那么既然毛泽东自己都不当，其它任何人也都不能当！国家主席一职在中国意味着国家元首，名义上对军队有统率权，即使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毛泽东也不会再让给别人了。正是因为毛泽东很在意这一“装饰品”，故毛泽东必须对此坚持到底。从中共的组织原则来讲，中共当政者的实际权力来自于执政党——中共中央，中共历来坚持的是，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这个党主席从来以“中央”自居。刘少奇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国家主席，而是来自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因而才可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倒台后，由毫无实权的董必武任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甚至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需要时才出来应应景，平时几乎是无事可做，因此“国家主席”在当时仅仅是个政治上的花瓶而已。毛泽东口中的“年轻人”——纪登奎、汪东兴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构成对林彪地位的威胁，林彪又何须对此担心呢？林彪本人是中共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是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只须韬光养晦、按部就班即可接下毛泽东身后的大位，林彪有何理由和必要去追求这个毫无实际权力的国家主席职位，步刘少奇的后尘呢？

（3）该书作者认为：“……因此，不管是林彪在‘紧跟主席’，还是叶群出于家庭的野心主动争取，他们都在催促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军方成员（吴法宪将军和李作鹏将军）坚持设立国家主席。”（该书331页）

该书作者说林彪和叶群（出于“野心”？）都在“催促”吴法宪、李作鹏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并没有事实依据。该书作者有可能受到汪东兴等人日后根据政治形势批林的需要而“回忆”的影响，如汪东兴回忆说：“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25—26页）林彪在当年的4月11日从苏州通过电话向毛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彪还表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周恩来年谱》下卷361页）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林彪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970页）显然，政治局多数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见。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的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上他的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周恩来年谱》下卷386—387页）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比林彪走得更远、也更积极。汪东兴特别突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无非还是想证明林彪有野心，林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至于叶群的那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已经被证实，那不过就是中央专案组制造出来伪证而已。

（4）该书作者说：“8月13日，庐山会议前夕，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此分成两派。此次争

论的是宪法中要不要写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该书331页）

此处的叙述不够准确。吴法宪、张春桥等争论的是，要不要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写进宪法草案。（《周恩来年谱》下卷385页）

〔5〕该书作者说：“为了尊重毛对担任国家主席的反复推辞，林用了一个不大正式的术语（“国家元首”）以表达毛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意思。”（该书333页）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原话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1970年8月22日，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定稿。林彪在8月23日讲话中称毛为“国家元首”就是依据草案中称毛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而来。这一用语实为中央正式通过的对毛泽东的称谓，并非林彪自己独创的“不大正式的术语”。当然，作者的这一说法总比某些人坚持的林彪提“国家元首”是“改换另一种用语，表达他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10页）明智得多。（可参阅余汝信《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92期，2009年3月9日）

〔6〕该书作者认为：“林立果是一名军官，尽管年轻，却已在吴法宪的庇护下，执掌空军大权。”（该书337页）

该书作者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大概也是受到中共官方多年来夸大宣传的影响。中共官方在“913事件”后指控吴法宪“将空军的大权交给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等。但是，试问林立果在空军执掌了哪些大权？是指挥了空军战斗部队，还是任意调动了空军部队？吴法宪曾经在私下里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林立果说过这番话，吴自己承认那不过就是为了讨好林彪，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将空军的大权交给林立果。吴法宪说：“事实上，关于空军的领导权、调动权，我从没有交给过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里也没有一分钟是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凡是懂得我们党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981页）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的几个秘书和他周围的几个亲信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林立果最多也只是利用了一架256号专机，其实那也还是在空军专机师正常的专机调动业务范畴之内。

〔7〕该书作者在林彪事件一些问题上持有西方学者经常持有的“阴谋论”的看法，但是“阴谋论”大抵都是想象和臆测，与事实相距太远。我们不妨再予以详尽的辨析。

（一）有关毛泽东为何同意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那番讲话，该书作者说：“毛为什么要同意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煽动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们的批评导致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他是不是希望现在激起类似的反应，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庐山上的行为也同样让人想起了1966年他对彭真的处理。当时他赞同后者的《二月提纲》，但是不久后又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次距离他的愤怒反击只有48小时了。”（该书332—333页）该书作者怀疑毛泽东在庐山上为林彪设下了一个圈套，静等林彪上套，从而一举收拾林彪及其同党。然而，怀疑归怀疑，但却于史无据。

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的直接原因是，吴法宪与张春桥在宪法修改草案会议上的争论。在8月份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草案时，张对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即“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原本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在1970年的8月13日的政治局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569—1570页）

张春桥为何敢于向林彪作挑衅，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张春桥自恃其背后有江青的支持，而江青的背后当然就是毛泽东。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中央工作格局的不满，江青等极左派们认为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中他们出力最多，本应取得更多的权力，但实际上九大之后他们权力仅仅局限在文化宣传领域，政治方面的权力却十分有限，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周恩来手中，而周恩来又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张春桥等人即使执掌了文宣方面的权力，但依然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制约，想发个中央文件都不能如愿以偿。面对九大后的政治局势，江青等人当然心不甘、情不愿，一有机会就要发难，只有不断挑起新的斗争，才能将已经大大趋缓的文革运动再次推向新的高潮。林彪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针对张春桥的批评的讲话，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为所欲为有所节制和批评。正如文革史家程光所言：“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们，是前不久‘八一’社论和十天前吴法宪和张春桥争吵的继续，是林彪直接对江青等人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对文革派在‘九大’后抵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干扰和破坏团结的批评。事情是文革派挑起来的，对江青不便明着说，只好指向张春桥。庐山之争已成必然，只是以什么题目、用什么方式爆发出来而已！”（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还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毛泽东不可能预见到吴法宪和张春桥会在宪法修改草案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也不可能预见到林彪会站出来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因而毛泽东不可能预设圈套让林彪来钻。事实上，林彪自己是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也还有些犹豫，而在陈伯达和叶群的鼓动下，林彪终于站上了批张的第一线。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丁凯文《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载《记忆》第11期，2009年1月11日）林彪在讲话前向毛作了请示，得到毛的许可。据陈伯达回忆：“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它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商量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374页）吴法宪从叶群处得知，开会前林彪请示毛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而毛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吴法宪说：“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下卷793页)以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在开幕式上从无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都不发表讲话的先例。林彪要求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乃合情合理之事,并非什么“突然袭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林彪一提他要讲话的内容,毛泽东马上就意识到林彪的用意,随即表态“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同意林彪讲话,毛关心的是不要“出格”——即“不要点名”,要将“批评”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是毛泽东预设圈套的话,应该是毛泽东鼓动林彪讲话,要求林彪去批评张春桥(事实上,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当时的政治情势),而非反过来林彪向毛表示要发表讲话。因而,“阴谋论”一说在此是站不住脚的。

(二)该书作者另一处“阴谋论”是,“汪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在毛盘问他关于国家主席的事时,他的解释是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后昏了头。人们会怀疑:为什么毛会在与自己如此密切的关键岗位上保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官员。主席将痛斥陈伯达。为什么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即煽动起人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们的的情绪,让毛有借口打掉忠于林彪的军队派系”(该书334—335页)该书作者似乎认为,汪东兴在庐山上被毛泽东当了枪使,被毛所利用,毛泽东不仅给林彪预设了圈套,还利用了汪东兴诱骗众多的中央委员们上当,参与拥护林彪打击张春桥。然而,这一“阴谋论”依然于史无据。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后所扮演的角色,笔者曾有专文予以论述(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文革史家余汝信也撰文予以论述。(余汝信《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载《记忆》第23期,2009年5月20日,又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704期,2009年6月8日)汪东兴曾经是铁杆的林派,不仅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有密切的来往,思想上有共鸣,且积极参与了庐山会议上的倒张活动。可以说,汪东兴几乎就是林彪在毛泽东身边的“卧底”,毛泽东及其周围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会由汪东兴传达给林彪。有意思的是,汪东兴这个“卧底”并非是林彪有意发展出来的,恰恰是出于汪自己的主动。因此,汪东兴实为林彪为首的军队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是否事前就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之间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在庐山上为何放过汪东兴而将陈伯达一举打倒?

笔者认为,毛泽东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极其丰富,炉火纯青,在抓大的问题和主要矛盾方面尤其老道。庐山会议上针对张春桥的斗争,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是由于林彪讲话而引起,下面搞得沸沸扬扬,根子却在中央。对于张春桥,毛泽东必须加以保护,否则一旦毛泽东松口,张春桥立即就会倒台,连带着张春桥从事的活动以及其它文革极左派也可能落马,文革成果由此不保。对于林彪也不能贸然予以批评,林彪是毛泽东自己在文革中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批林会导致思想上更大的混乱,对于政局的稳定尤其不利。而陈伯达是唯一可以被牺牲的人,陈伯达是从文革极左派分裂出去的文人,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实力,转向林彪的军队一方更多的是因为政见上的共鸣。为了抑制这股反文革极左派的浪潮,拿掉陈伯达是代价最小、见效最快的办法,毛泽东不缺“秀才、文人”,张春桥、姚文元都可以随时取代陈伯达,打掉陈伯达对林彪也是一个警告,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因此,陈伯达成为庐山会议上首位蒙难者,这完全出于毛泽东的政治考虑。毛泽东为什么会放过汪东兴?笔者认为,毛泽东并不清楚汪东兴与林彪方面的密切关系,一来,汪东兴并未卷进政治局内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争论,未曾与张春桥等人形成直接的对立和斗争;二来,汪东兴也从未涉入政治局内具体的工作,自然也不会与张春桥等人发生冲突。汪东兴是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枢纽,是个负责上传下达的“御前行走”。毛泽东本人又有先入为主的习惯(这一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有很传神的叙述),汪东兴主动检讨,推卸责任,洗刷自己,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另外,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毛泽东还非要汪东兴去办理不可,故毛泽东放了汪一马。这点,江青曾予以证实。据参加庐山会议的徐景贤回忆,王洪文曾问江青:“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江青则说:“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

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219页）江青在自己圈子里讲话不必藏藏掖掖，是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在庐山上向毛泽东告的状，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如果江青和毛泽东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汪东兴。日后汪东兴积极与军委办事组划清界限，嫁祸于人，李雪峰、郑维山的倒台以及王良恩的自杀都与汪东兴有密切的关系。“913事件”后汪东兴更是落井下石，积极主动地要求抓捕黄吴李邱，并充当林彪专案组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汪改变了毛泽东对黄吴李邱采取软禁的作法，而将他们关进秦城监狱，将党内矛盾变为敌我矛盾，这些都是汪东兴为了掩盖自己行为所采取的卑劣手段。由此而观之，汪东兴在庐山上的言行是主动的，自觉的，是庐山上斗争张春桥的主角之一，绝非是被毛泽东当了枪使。因此，“阴谋论”在此是说不通的。

（三）该书还有一处“阴谋论”是，“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人们有理由怀疑毛希望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一事捉到林彪的马脚，即假定林以为自己作为接班人，也应该像刘少奇那样担任这一职务。这种可能性得到下述材料的佐证。……”（该书329页）“从毛对待彭真、刘少奇、邓小平和其它人的政治游击策略来看，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主席有意诱使林彪接替国家主席一职，让其名声赶上毛的地位，自己先表示默许，日后还可以斥责其人是野心家，即垂涎于国家主席的宝座——林彪死后，批林的材料给林按的正是这个罪名。由于林彪坚决拒绝这一职位，这一计谋没有奏效。在庐山会议上，毛继续实施这一策略，对林彪大加勉励，并做出了有关张春桥和江青的暗示。”（该书340页）

毛泽东有无引诱林彪出任国家主席的意图和言行？目前并无任何资料可以支持，于逻辑也不通。诚然，1970年3月，汪东兴曾代毛泽东传话给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随后汪东兴请军委办事组诸人去汪家闲聊，汪再次说起毛泽东的话“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说者和听者都很兴奋，都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关怀。（《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775—776页）但这绝非是毛泽东的真心话，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在后来改口说可以让董必武、陈永贵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几次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一来自己不必出任这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二来也堵死了其它任何人对该职的觊觎。文革史家余汝信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的辨析：“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但国家元首的位置不能空置。《草案》给予毛泽东一个国家元首（条文中称之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的名份，毛是欣然接受的，否则，由一个党的主席统率国家军队，在国际上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惯例的，真真正正是‘名不正，言不顺’。”“毛泽东只是说不设国家主席，但他从来没有说不要国家元首，且他心目中的国家元首永远是他自己。……在毛看来，国家元首代表了国家军队的统帅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林彪虽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但并没有被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副元首’的尊号。元首是唯一的，仅仅就是毛一人。”（余汝信《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92期，2009年3月9日）

事实上，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庐山会议前后，并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不过就是宪法修改草案当中诸多议题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就宪法修改草案准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有国家主席条款，另一个是没有国家主席条款，最终通过哪个版本的草案要视毛泽东的态度而定。连大陆的党史教材也不得不承认“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本是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不能因为毛泽东讲了一不，别人就不能有不同意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208页）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亦未曾主张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事后毛泽东猛烈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回京后被迫作检讨也与国家主席问题不沾边。事实证明，“设国家主席”绝非林彪的什么“政治主张”。

毛泽东视自己为国家元首乃天经地义，这也得到其它中央领导人集体的拥戴，毛完全没有必要对林彪来个“引蛇出洞”，毛泽东将自己担任国家主席比喻为“放在炉火上烤”，难道林彪就不会这样认为吗？毛又有何把握林彪一定就会上钩呢？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出乎了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对林彪问题的重视始于此次会议，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遂逐步采取措施压迫林彪一系军人作检讨，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的办法拉出来、打进去，予以分化瓦解。说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不过就是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途中给林彪量身订造的罪名。正如余汝信所言：“所谓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议，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才着力渲染出来的！”“将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归结为某一位领导人的‘反党政治纲领’，是毛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手法。显然，国家主席问题，不过是林彪事件之后用以打人的一个工具。今天回过头来看，国家主席问题，不是林彪的心病，恰恰是毛泽东自己的心病。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声称‘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恰恰反映了毛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刘少奇当过的，毛决不会再去当，毛不当，别人也不能当。总之，中国只能有一个主席，不能有两个主席，文革前曾有过的两位主席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并列的情形，不能再发生，不管那另一位是姓刘、姓林、抑或姓其它什么！”“所以，指称‘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无非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与夭折》，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97期，2007年9月11日）因此，该书作者所持的“阴谋说”并无坚实的证据和合理的逻辑。

□ 原载《记忆》2010年8月30日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九）

• 舒 云 •

96、林彪是怎样当上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的？

林彪一向没有官瘾，而林彪的“官”都是毛泽东提议的。1958年，毛泽东提议林彪当政治局常委。这时林彪身体好一些了，出来多一些。但中央开常委会，叫林彪去，他不去。1958年2月，毛泽东到上海，看望林彪，坐了将近一小时。林办和毛办的秘书退出，叶群有时在场。接着八大二次会议增加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之后排名就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了。林彪挂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还是当“甩手掌柜”，没有具体分工，冬天到广州，3、4月到上海、苏州，夏天到北戴河。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参加反军队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信是他自己写的，毛主席亲启，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签字后退回。1959年林彪上庐山，秘书关光烈跟着去了。不存在林彪夺彭德怀军权的问题，这时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已经在彭德怀之上，只是没有具体工作罢了。周恩来找林彪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由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全军的事都要管。林彪叫秘书关光烈给周恩来打电话，他的身体担当不了国防部长。关光烈回忆，林彪在楼上住，我在楼下住，叶群拦住我，叫我不要打这个电话。叶群对林彪说，毛主席这么信任你，说了也没用，干脆就别说，我来帮你。后来林彪再没谈这个事。1960年春，林彪叫关光烈给军委办公厅的萧向荣打个电话，让叶群当办公室主任。林办秘书都知道，林办的大权握在叶群手里，所以叶群希望林彪的官越大越好。

1966年8月1日，宣告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7月24日才发开会通知，汪东兴受毛泽东之命，几次打电话催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马上回北京。专机停在大连，林彪知道，“骑”上去就下不来了。他托病不出，写了报告，说他不接受当“接班人”。以前罗荣桓活着时就请他向毛主席说过他不想干。毛泽东在林彪报告上批示，还让他干。林彪把有毛泽东批示的报告撕毁扔进痰盂，以示他的坚决，叶群则小心地从痰盂里捞出碎片粘好。

毛泽东坚决要林彪“出山”。周恩来亲自劝，江青也给叶群打电话，叫叶群和林立果回北京。林彪没办法，只好说，不让林立果回北京，叫叶群回去就行了。这时大连已经发生武斗，外面很乱。林彪临走，对林立果说，你在这里好好复习功课，过一段大学开学，好好上课。林彪对林豆豆说，你先不去北京，好好呆着，我过几天就回来。实际上林彪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吴法宪的女儿金秋说，8月7日，林彪坐专机从大连到北京，吴法宪到机场接。本来想讨个好，见林彪毫无喜气，脸色阴沉，吓得连话也没敢讲，赶快溜掉了。

林彪一推再推，最后到北京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说，汪东兴安排林彪住进有空调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我们刚到，毛泽东就赶来与林彪谈事。林彪还是说身体有病，不愿接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想当明世宗（明嘉靖皇帝，虔诚道教，不问政事），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毛泽东为什么再三再四要请出林彪呢？1967年5月，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说，（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有很多人仍然不通，我只好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从会议的时间上也可以说明问题，正式会议前还有几天预备会，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7月24日、25日的讲话。邓小平宣布，毛泽东决定正式会议开5天。邓小平、刘少奇、陈伯达讲话，再开3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实际上这个会议不得不又延长了7天。原来，毛泽东得不到多数的支持，所以一定要林彪当“援兵”。林彪回北京的第二天，8月8日晚，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讲话，表示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8月12日全会闭幕，接着开中央工作会议，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林彪在会议第一天讲话，讲了文革问题和干部问题。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会议有五件大事，一、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三、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明确指出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四、通过《十六条》；五、毛泽东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名单，会议发了有毛主席批示的重新排名的文件。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非常奇怪的是，会议没有罢免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的乌纱帽却“莫名其妙”的丢了。林彪“跳”到了第二位，成了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

8月12日，林彪在全会上宣布，改选结果不见报，表明他还是想找台阶下台。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就泄露了“秘密”。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重要讲话，这已经“不打自招”，说明党中央在人事上有重要变动。会后新华社的报道，按全会选举结果重新排了座次。就这样，林彪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满世界都知道了。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97、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的陷阱吗？

1970年4月11日23时30分，林办秘书于运深遵照林彪指示，打电话给毛泽东秘

书：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现在公布的这一段话，看不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意思。可是这段话的前面呢？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是回答，而不是自作主张。因为林彪有一个“仍然建议”，就是说，林彪以前是这样说的，某人说了不同意见，林彪这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才“仍然建议”。某人的不同意见是什么？为什么省略掉了？而且，林彪的三条中有两条是关于设国家副主席的，是不是也是回答某人让他当副主席的意见？总之，在林彪这个电话记录前，还应该有人一段重要的话。原来，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意思，并当成大喜事让叶群立即报告在苏州的林彪。所以才有了林彪回答的这段话。

1970年3月8日，汪东兴从外地回到北京，受毛泽东委托，向中央政治局传达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指示。最后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一段话：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吴法宪回忆：林彪照例是没有出席中央政治会议的，会后汪东兴请叶群向林彪转达。汪邀请吴和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大家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进了汪东兴的家，在客厅坐了一会儿。话题自然转到设国家主席上，汪东兴说：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叶群和我们都很高兴，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特别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这里有个疑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他老是向叶群和黄吴李邱透露毛泽东的信息，毛泽东怎么能容忍他吃里扒外？为什么没有处理他？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放长线”。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大力主张设国家主席，并说代表8341部队。如果没有毛泽东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思，汪东兴怎么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陈伯达被打倒了，而汪东兴却能在毛泽东的保护下安然无恙？但是，林彪没有回应毛泽东让他当国家主席的这段话。

林彪到底是怎么想的，毛泽东摸不到底。

1970年4月初，毛泽东特地带张春桥到苏州去看望林彪，说要住在苏州。叶群忙着让工作人员收拾房子，后来毛泽东又改变主意，让林彪到专列上去见他。林彪把刚送给他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录音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和林彪、叶群说了不短的时间，叶群还专门整理了一个谈话稿，在广州军区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传达过。毛泽东对林彪说，你要考虑接班人了，让小张（春桥）当总理怎么样？林彪说，还是应该重用那些跟您打仗的红小鬼。

这次会见，毛泽东没有提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事情，林彪也没有回答谁当国家主席的事情。双方都在刻意回避？表面看，这次会见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劝说林彪上庐山。林彪说：我要上更高的山上去，我要上“五台山”。林彪知道毛泽东心里是想试探他如何应对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又不直接问。而林彪则装糊涂，根本不提这件事。但林彪心知肚明，知道无论如何是要回答毛泽东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4月11日，林彪让秘书于运深给毛泽东秘书打了电话，回答了前面提到的三条。

吴法宪回忆：1970年5月17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工作，黄吴李邱四人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说毛主席说过，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

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的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回忆：当时，总政治部负责汇集全军讨论宪法修改意见。几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意见总是对立的。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复杂了，矛盾不是通过工作得到化解，而是交锋之后反而加深。李德生虽初到中央，却深感中央斗争的复杂，他小心地保护自己，不轻易发表意见。此举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李德生成为毛泽东九一三事件中的重要力量。

其实，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完全由毛泽东一手操纵。他先把当国家主席的意思强加给林彪，再批判林彪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从始至终也没有说过要当国家主席，这强加的罪名似乎幼稚可笑。

（未完待续）

□ 选自 舒云\_新浪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